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日内瓦

## 2004 年贸易和发展报告

### 概 述



联合国  
纽约和日内瓦，2004 年

## 概 述

### 全球趋势和前景

目前全球经济形势较一年前看好。2003 年世界产出和贸易恢复增长，因此现在广泛感到乐观，认为 2004 年增长加速可以使业绩恢复到上个十年期末的水平，世界经济可能会进入一个较长的增长期。

然而，实际上，持续恢复的前景与 1990 年代初期相比，则较为模糊和不确定。主要工业化国家之间在国内需求力方面仍存在巨大差异，而且主要经济集团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也在加剧，这些都可能导致新的保护主义压力，加剧货币与金融市场的不稳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不利影响。此外，石油价格的飞涨和未来动态的不确定性，以及石油价格可能对通货膨胀和利率造成的影响是另一个令人担忧的理由。

此外，发达国家之间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收入增长分布不均，前者是欧元区继续滞后，后者是迅速和持续的增长继续集中于东亚和南亚。同时，在撒哈拉以南多数非洲国家，人均收入停滞不前，而拉丁美洲持续增长的基础仍然非常脆弱。事实上，全球经济形势的改善只能归因于少数国家经济业绩异常优良，对其它经济体的作用差异甚大。

世界经济恢复的驱动因素主要是美国经济以及东亚和南亚经济的持续迅速扩展。美国经济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的增加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有力的需求推动。另一方面，亚洲若干发展中经济体，特别是中国，不仅进口出现增加——这也附带地对亚洲和太平洋区域的经济体产生了有力的影响，而且出口增长率也达到两位数。

全球经济对美国经济的依赖并不是一种新现象，但美国如今的赤字远远高于 1990 年代末期。这是个令人关注的问

题，因为如果美国的预算赤字高，就需要进行财政调整，而且考虑到由于进口价格、特别是石油进口价格急剧上升造成的通货膨胀压力，或许还需要改变其异常扩张性的货币政策。

地缘政治的紧张状况和种种投机因素是石油价格飞涨的主要原因，2004 年上半年油价已达到 1990 年代初期以来的最高水平，不过，全球经济的恢复和中国对石油迅速上升的需求也推动了这种上涨。石油价格大幅度升高可能会损害石油进口国的增长，特别是发展中世界的一些石油进口国，这些国家面临严重的国际收支问题和外部融资限制，虽然它们有可能因向石油出口国增加出口而在相对较小的程度上获益。而且，如过去曾出现过的石油价格迅速上涨时期一样，石油出口国可能无法立即将额外的石油收入转化为对石油进口国产品的更多需求。虽然，石油价格的升高眼前尚未对工业化国家产生通货膨胀影响，但如果价格在中期内保持目前水平，就不能排除这种影响。这种情况反过来又会导致利率提高。

美国目前越来越专注于与东亚之间的贸易金融互动关系，这也可能导致财政和汇率更加不稳定。美国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一直是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国家重要的出口推动力，并有助于该区域形成巨大的经常账户盈余。另一方面，自 1990 年代末货币贬值以后，东亚的发展中国家一直遵循一种政策，将其汇率保持在具有竞争力的水平上。这需要对外汇市场进行大量干预，促使迅速积累储备金。由此，东亚一直在将经常账户盈余直接再循环到美国，用越来越多的外汇储备金购买美国联邦债券，填补了美国一大部分经常账户亏空和预算赤字。2003 年，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发展中国家购买的外币超过 2100 亿美元，相比之下，美国的预算赤字为 4550 亿美元，贸易逆差为 4900 亿美元。就长期来看，这种形态不大可能持续，特别是如果美元贬值压力由于美国赤字进一步升高而增强则更不会持久；反过来，这种情况又会促使亚洲各中央银行设

法尽量减少风险，转而寻求所持有的外汇多样化，购买以其它货币计值的资产，特别是以欧元计值的资产。

由于 2003 年东亚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及转型经济体前所未有地增加储备金积累，使国际收支盈余得到再循环，出现了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向发达国家的持续净资本外流，数额约达 2300 亿美元。更何况，当时流入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私人资本还大量增加，并达到 1997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另一方面，虽然外国直接投资仍然是流入发展中国家的最重要的私人资本类型，但由于曾是 1990 年代外国直接投资的驱动力的私有化浪潮逐渐平息，跌到了 1996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相反，信贷和短期资本流量显著增加，但其中大部分受到高利率或货币升值预期的吸引，流入了少数新兴市场经济体。事实上，相当大一部分私人外部融资没有流入有外部融资需求或投资率低的经济体。相反，这些资金主要流入了那些因迅速扩大出口而往往已具有相当规模的经常账户盈余的经济体，增加了它们的外汇储备。这也表明不能将资本市场视为发展资金的一个稳定来源。而且，在对国际金融市场的预期极其不定的情况下，许多发展中国家对于浮动其货币存在明显的担心，所以，应当进一步努力，争取加强国际贸易体制与国际货币和金融体制之间协调一致，这个问题将在后面予以讨论。

随着东亚和南亚形成一个实际上的美元区，为调整全球的不平衡状态，或许需要在世界其他地区对汇率实行更明显的改变。为了能够在美国赤字不持续增加和对美元的压力不持续上升的情况下维持世界经济增长势头，就必须促进其它主要工业化国家的需求增长。但是，多数欧洲经济体的增长本身继续依赖出口。尽管欧元相对于美元已经升值，但欧元区仍能获益于美国近期的恢复，这证明了欧元区工业的竞争力，但国内需求仍然疲软，主要是因为经济政策无力提高三个最大经济体的消费者对收入的预期。如果不引导欧元区摆脱传统的财政和货币

政策，那么世界贸易中越来越多的不平衡状况将迫使实际汇率产生进一步的、乃至更急剧的变化。

### 区域趋势和新的贸易地理格局

由于采取了一种异常有力的财政刺激措施并将利率降至 50 年来的最低水平，所以帮助美国经济走出了 2000 年开始的经济疲软阶段。政府开支主要因为国防支出急剧上升而增加；公司利润提高，终于促使企业投资获得了等待已久的增加；而且家庭消费有所恢复；所有这些因素汇合起来，使国内需求大量增加。对比之下，尽管 2003 年美元相对于欧元和日元仍继续疲软，但外部需求的增长速度远低于进口的增长速度。因此，日益升高的巨大贸易逆差仍是一个令人关注的主要问题，因为它可能进一步迫使美元下跌。

此外，鉴于美国预算赤字的规模，财政政策将需要加强限制，而向一种限制性更大的货币政策转变可能加重家庭高债务问题，结果可能成为持续扩展的一个主要障碍。因此，有人十分怀疑美国的增长及其对世界经济的积极影响是否仍能像 2003 年及 2004 年上半年那样有力。

在欧元区，国内需求仍然疲软。欧洲中央银行不愿采取更积极的扩张性政策。尽管增长减缓，但欧洲的实际短期利率一直高于美国，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空间受到《稳定和增长条约》的限制。这与联合王国的情况形成对照，该国针对 2000 年后全球增长减缓采取了反周期财政政策，促成其增长率大大高于欧洲大陆国家。目前许多欧洲公司试图通过削减工资来提高国际竞争力，这将使国内需求更加疲软。最终，当金融市场意识到世界经济并没有获得必要的推动力来克服现有的不平衡时，出现欧洲货币过于高估的可能性会大大上升。在这种情况下，欧元区及其主要贸易伙伴将有可能陷入低增长、高失业率的境况。

日本经济经过十年的停顿，终于在 2003 年实现了产出增长的显著恢复。虽然公司投资有所回升，但恢复主要归因于外部需求的增加。日本 2003 年对美国的出口下降，而出口动力主要来自中国持续有力的需求，这表明亚洲内部和亚洲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形态发生了变化。然而，由于严重依赖国外的需求，所以日本以出口为主导的恢复比较脆弱，容易受外部条件变化影响，特别是受货币浮动的影响。

2003 年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上升，2004 年仍可能如此。虽然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加快了，但其水平在区域之间和区域内部都存在显著差异。东亚和南亚地区由于国内和国外需求进一步扩大，增长势头最强，并且 2004 年仍会进一步加速。该区域多数国家通过为发展基础设施进行公共投资和创造有利的货币条件，保持着扩张型的态势。该区域内部汇率稳定，而且投资额和国内生产总值都有显著增长，这有利于在迅速增长的区域内贸易和投资环境中实现专门化。

中国在这个进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甚至可以说，2003 年和 2004 年初期，中国是该区域多数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中国的进口在不断增长，速度甚至快于出口，其中一大部分来自亚洲其它国家。2004 年，东亚和南亚可能会继续迅速增长，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尤其如此。但是，中国某些经济部门目前出现过热现象，政策的限制性也在加大，这连带影响到该区域的其它国家，包括日本。

虽然向美国出口仍是东亚和南亚总产出量增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该区域已形成一种区域内需求和专门化形态，当使该区域能够维持一种相对稳定的增长趋势，不受世界其余地区中存在的周期性问题和结构问题的影响。

拉丁美洲经过两年的人均负增长阶段，于 2003 年下半年经济活动开始得到改善。一些国家改变了僵硬的汇率制度和币值过高的状况，重新获得了国际竞争力，并且宏观经济管理方面也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2002 年贸易平衡得到改善，很大程

度上是因为压缩了进口，而 2003 年贸易情况进一步改善则主要是因为增加了出口，从而刺激了经济的恢复。虽然对于整个区域来说，预计 2004 年增长速度将进一步加快，但阻挡拉丁美洲恢复持续高增长率的严重障碍依然存在。尽管货币状况得到了改善，但在若干国家，固定资本形成已降至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如果该区域一些主要经济体采取的新政策行动能成功地刺激国内需求，便可能促成更持久的恢复。为了使投资和私人消费都能够大幅度恢复，除了实现更公平的收入分配之外，将需要减轻公债负担，改革某些国家的财政结构，还要以低于过去的利率提供更多的国内信贷。

非洲大陆从世界经济恢复中的获益少于其他发展中区域。非洲经济有所增长，是因为初级商品价格有所提高。北非经济大幅度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天气条件有所改善、石油价格上涨以及旅游再度兴旺。但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贫困和缺乏社会照顾仍是最大的危害之源，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仍然滞缓，这意味着人均收入进一步停滞。鉴于多数撒哈拉以南经济体面临严重的融资制约，投资率始终太低，不能达到必要的多样化程度，无法生产增值较高和在国际市场中活力较大的产品，而有了这种多样化才能更迅速地融入世界经济，并降低本区域一直在外部冲击面前的脆弱性。依赖国内储蓄和私人资本流入不能使公共和私人投资水平实现必要的增长。减免债务和以赠款形式提供更多的官方发展援助，对于在这些国家减轻贫困和改善社会状况是必不可少的。鉴于人均收入增长持续不佳，现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似乎越来越没有可能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特别是到 2015 年贫困减半的目标。对于多数国家来说，增长必须翻番并持续十年以上才能实现这些目标。

中欧和东欧转型经济体在 2003 年也实现了较高的增长率。在 2004 年，由于出口增加和国内需求旺盛，这些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当能再次加速增长。在独联体国家成员国中，石油出口收入大大提高，从而有力地支持了增长。欧洲联盟的

扩大和经济活动向低工资的转型经济体转移，有利于它们进一步融入欧洲大陆的一种新的分工。

导致世界经济恢复和形成发展中世界区域增长模式的进程，证实了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重要性。凡是推动了世界其余国家增长的经济体，其货币和财政政策都支持国内需求的增长。这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都是如此。此外，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在预防外部限制和为放松银根创造政策空间方面可以发挥决定性作用。

2001年下半年以来采取了许多与安全有关的措施，可能对贸易成本以及货物流动产生不利影响，特别是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货物流动产生不利影响。不过，2003年和2004年上半年世界贸易仍然显著扩大了，但与1990年代后半期不同，那时贸易迅速扩大的主要原因是出口量的增加，而2003年贸易增长的三分之二是因为以美元计的出口单位价值急剧上升。美国经济的恢复以及被称为“新贸易地理格局”的现象推动了贸易的扩大。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在世界贸易的扩大中发挥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的作用：2002年和2003年，它们占世界出口量增加的四分之三，进口量增加的60%。这既反映了需求增长的国际形态，也反映了制造业生产正在转移到某些区域，特别是东亚和南亚地区以及中欧和东欧的转型经济体。事实上，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亚和南亚国家，已成为范围广泛的各类制成品和初级商品的重要市场，而它们同时也在非常迅速地扩大自己的制造业。因此，与依赖扩大服务部门实现的增长相比，它们的增长需要消耗更多的能源并投入更多的初级商品，如金属、农业原材料等。此外，鉴于这些国家的人口规模，食品需求量也一直在有力地扩大。

由于需求增加，特别是由于亚洲经济体迅速扩展带来了更多的需求，按现值美元计的初级商品价格在2003年连续第二年上升。然而，由于发达国家出口制成品的美元价格也在上升，所以总的初级商品贸易条件没有得到改善，而且某些类别



初级商品的贸易条件甚至恶化了。此外，必须对照美元相对于其它主要货币的贬值情况来看待按美元报价的初级商品价格的变化。对许多大型消费者而言，美元价格的上升被汇率变动所抵消，但那些将本国货币与欧元挂钩的初级商品生产者，特别是非洲金融共同体地区的非洲初级商品生产者的出口收入受到不利影响。此外，金融和货币市场的情况也增加了对初级商品的投机性需求，而这可能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发生逆转。无论如何，非石油类初级商品的价格实际上始终保持在极低的水平，远远低于 1980 年代初期的水平。

### **政策一致性、发展战略和融入世界经济**

自 1980 年代中期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将密切融入国际贸易体制作作为经济改革议程的一个支柱。它们为了设法实现这个目标，不仅积极参与多边贸易谈判，而且还迅速实行单边贸易自由化。许多国家与此同时还开放了它们的金融部门和资本项目。迄今，除智利这样一些显著的特例以外，这种可以被称为“开放模式”的战略尚未能够使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国内资本形成与出口增长之间建立起有效的相互作用关系，而这种相互作用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的追赶进程以及 1980 年代起出现的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基础。

一个切实可行的发展议程需要比“开放模式”所提供的更复杂的分析和政策框架。一个根本问题是如何加强国家发展战略与全球进程和纪律之间的一致性，以及影响到发展中国家发展前景的全球经济各部门之间和内部的政策一致性。国际贸易体制与国际货币和金融体制的“对接”特别重要。

## 开放、融合和国家政策空间

以协调一致的方式对待贸易、宏观经济和金融问题之间的相互依存性，曾是讨论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个讨论最终促成了战后的国际经济体制。战后国际贸易制度的结构基于一种看法，认为在国际私人资本流动严格受限的条件下，一种具有固定但可调整汇率的可兑换货币的国际货币体制，可以提供一个有利于贸易和投资的稳定环境。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关贸总协定》)之下，这个制度将关税视为唯一合法的贸易政策措施。所采纳的汇率制度支持《关贸总协定》的方针，因为国际贸易谈判的参与者可以在不必过分担忧其它外来因素的情况下，预料削减关税会对国内工业竞争地位产生的全部影响程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即成立了一些政府间机构，但是它们的任务基本上不涉及参与战后国际贸易体制的发展中国家的具体问题。更何况，由于国际私人资本流动受到限制，而且官方发展援助仍然有限(且往往附带条件)，国际贸易的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被认为是可以消除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方面种种资源限制的一种可靠手段。开展了多边努力，设法制定一个贸易体制，其中要顾及以增长缓慢和贸易条件不利为特征的发展中国的政策选择，这种多边努力的最高体现就是 1964 年召开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第一届大会。提交该会议的报告详细阐明了一项战略，目的是要帮助较贫穷的国家通过有力的资本形成以及持续和加速扩大传统及非传统出口实现外向型发展。该议程的核心思想是，发展中国家必须具备足够的政策空间、能够加速资本形成、实现经济结构多样化并提高发展的“社会深度”，才能凭自己的努力来发展经济。此外，这个议程还强调贸易与金融之间的相互依存性，因为，特别是在工业化初期阶段，进口的增长速度几乎肯定快于出口，提供资金弥补二者之间的差距是加速增长的关键。

随着放弃固定但可调整的汇率制度并采纳范围较大的浮动汇率制，同时国际私人资本流动已恢复到类似于一战后至二战前时期内曾造成很大经济和社会不稳定的资本流动水平，国际贸易体制与国际货币和金融体制之间就更加必须协调一致。具体说，资本流动的自由化一般对发展融资水平几乎没有影响，而且，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制约并未得到解除。相反，金融流动与国际贸易发生脱节。短期资本流动的情况明显如此，其中 80%以上的交易属于往返流动，并且是出于套头交易、套利交易和投机交易的考虑。此外，短期国际私人资本流动量增多、不稳定性加剧，再加上国际投资者的汇率预期经常急剧起伏，对贸易不歧视原则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业绩都有不利影响。

因此，在评估国际贸易体制的运转情况时，应当考虑曾经对其规则作出过哪些更改，以便不仅能够处理国际贸易关系中的变化，而且还能够处理影响贸易的国际货币和金融关系。

#### **促进国际贸易体制、货币体制和金融体制之间的一致性**

有些国家成功地将融入世界经济与持续增长结合起来，从它们的经验中汲取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必须通过积极和井然有序的政策来增加物质和人力资本总量、为利用效率较高的技术创造条件，并将资源由传统的低生产率活动转到很有可能带来生产率增长的活动。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当实际货币升值时期阻碍了出口业绩时，实际货币贬值可以提高国际成本竞争力并增加出口。

贸易经营成功的一个条件是，发展中国家必须能够管理自己的汇率，不只要使汇率长期保持竞争力，而且要留出足够的政策空间，以便在面临外部冲击时能够有条不紊地作出调整。战后的体制结构为了达到这个条件，曾想在政府间基础上建立一个国际货币体制，使之具有固定但可调整汇率的可兑换货

币，并对国际私人资本流动加以严格限制。然而，部分由于最近 30 年资本流动的自由化，以及跨界金融交易的规模和种类都显著增加，而这种交易的方向可以根据国际证券投资者期望的变化而迅速转变，所以实行金融开放政策的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一直处于极不稳定和波动状态。这种不稳定经常给利率和汇率管理造成问题，而且还促发金融危机，包括在那些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曾有良好表现的国家。这些货币变动的特征往往是长时期的汇率上升，随后突然出现急剧下跌。

考虑到一般能够期望通过实际货币贬值来改善一个国家的贸易平衡，所以可以假定实际汇率的急剧下跌将更大地刺激国内出口商的国际成本竞争力，并推动一国的出口。但是，伴随实际汇率大幅度下降出现的后果，至少在短期内，可能严重影响国内出口商从因贬值而得到增强的国际成本竞争力中获益的能力。

这种后果可能出现在两个层次上。在私人企业这个层次上，名义汇率的变化可能对投资和国际竞争力产生重大影响，因为这种变化可能损害公司用以持续加强国际成本竞争力的手段。如果公司出口的货物具有较高的进口成分，则它们或许不能从急剧的实际货币贬值中获益，这样对其国际成本竞争力产生的净作用便很小。更重要的是，最近的经验表明，急剧的实际货币贬值可能造成公司无法扩大生产能力，乃至造成无法维持贬值前的生产水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放松资本控制将在货币急剧贬值后的一段时期内，严重影响来自国际来源的贸易融资水平。而且，随着贬值而来的国内银根紧缩往往使国内放款人难以持续提供短期信贷。

至于在宏观经济这个层次上的后果，关于汇率变化对贸易流量的影响问题的讨论经常强调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或强调货币贬值对于消除一国经常账户中的暂时不平衡现象的作用。通常，关注的焦点是相对较小的汇率变化产生的影响，而自 1990 年代初期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汇率经常大起大

落，给传统的讨论增添了另外一个方面，理由至少有两个。首先，一个经济体汇率急剧变化可能对保持汇率相对稳定的其他经济体的外贸地位产生不利影响。例如，亚洲危机的证据表明，竞相贬值是通过贸易联系蔓延的一种重要形式，因为那些本国出口商直接与受危机影响国出口商进行竞争的国家，为避免丧失国际竞争力，也面临本国货币贬值的压力。这还意味着受危机影响国的出口商不能如愿看到对自己产品的更高需求。

其次，汇率突然急剧下跌在国内产生的影响比因较小的汇率波动而进行的调整更复杂，因为，急剧的货币贬值通常与国内经济活动减少和需要削减中间产品和资本货物的进口有关。这种情况，与可获得的贸易融资量骤跌结合在一起，可能妨碍国内供方响应。因此，虽然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情况在“正常”贬值后通常得到改善，但重大的实际货币贬值一般不会成比例地带来较大的改善，因为这种贬值有可能损害出口商利用国际成本竞争力提高的能力。

实际上，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特别是短期私人资本流量的波动，可能降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并减少吸引投资者在发展中国家进行有助于提高生产率的投资的利润刺激。因此，有一种政策建议存在前后矛盾，这种建议一方面鼓励发展中国家迅速实行金融自由化，而另一方面又鼓励它们更多地依赖旨在提高生产率的投资来为改善贸易业绩加强竞争力。

多边贸易体制中的现有模式不能解决源于货币和金融体制的贸易业绩问题。而且，在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没有与这些剧烈波动有关的争端解决或补救机制。一个解决办法是审查《关贸总协定》中关于国际收支的规定。否则，已在一体化进程初期阶段便实行资本账户自由化的发展中国家，可能不得不采取措施，限制私人资本流动对汇率变动的影响，因为汇率变动不利于它们维持贸易平衡和其出口商的国际竞争力。

为了能够更公平地分配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利益，并能够尽量加强全球化对促进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作用，必须对国际贸

易体制、货币体制和金融体制进行变革，这需要综合处理贸易问题以及日趋相联的发展问题和总体国际收支问题。关于国际货币和金融体制的决定不应受制于狭隘的货币和金融考虑，而应当考虑到，这些决定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质部门(非金融部门)具有有力和持久的影响。

国家一级的措施不能代替适当的贸易、货币和金融安排。不过，避免币值高估已成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选择的战略。东亚国家率先尝试了这种办法。它们没有在追赶进程的初期阶段应用“开放资本市场战略”，而是尝试避免依赖外国资本流动。这使它们能够同时管理实际汇率和实际利率，前者是出口商国际成本竞争力的决定因素之一，后者则是国内投资的决定因素之一。

然而，有控制的浮动在全球范围中面临一个总合的问题。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在管理汇率变动的同时实现目标汇率。汇率顾名思义就是一种多边现象，如果许多国家都企图使货币保持在一种低估价值的比率，这最终可能导致竞相沉底——即竞相贬值，给世界经济带来 1930 年代所经历过的那种灾难。此外，考虑到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规模和内在的不稳定性，只有那些足够大并具有足够竞争力、能够抵住国际金融市场不断使汇率朝着某个方向移动的强大企图的发展中国家，才能成功地管理好浮动。一个开放的小型发展中经济体将很难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持续抵制促使其货币升值的强大趋势。

由于汇率政策与贸易政策具有相同的国际层面，所以采取类似于多边贸易体制中各种安排的多边和全球性安排将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办法。事实上，1940 年代建立货币基金组织时的主要想法就是要避免竞相贬值。在一个设计完善的全球货币体制中，必须权衡一国货币贬值的好处和给其它国家造成的不利。汇率变动如意味着偏离购买力平价，就会像关税和出口税一样影响国际贸易，所以这类变动也应受制于多边规章。这样一种多边制度，除其他外，特别需要各国明确说明进行实际贬

值的理由以及必要变动的范围。如果严格适用这些规定，可以避免个别国家的实际汇率中出现大幅度变动。

在没有一种多边办法来解决货币问题的世界中，对于通货膨胀率高或增长率高而又不是某个区域货币联盟成员国的国家，唯一的出路就是控制短期资本流动或实行低估币值和单方面确定汇率的战略。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通过通过对资本流动征税或通过对市场进行直接干预来限制这些流动的影响，从而防止具有破坏稳定作用的资本流入和流出，就不致于因为汇率变化无常而不得不作出最艰难的选择和发生配置不当；但是，采取控制或长期干预措施仍不能取代在区域和全球范围寻找一种适当的汇率制度。

贸发会议秘书长  
鲁本斯·里库佩罗